

# 注释与训诂异同辨

• 董洪利

训诂学是在长期的训诂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训诂”这个词的概念最初在单独使用时并不完全属于语言学的范畴。“训”作为名词是法则、标准的意思，而作为动词则是说解、解释的意思。“诂”作为名词是故言，即与现代语词有差异的古代语词，而作为动词则是“解释故言”。无论训也好，诂也好，其基本含义都是把古代流传的典章、法则、言语、道理等等对现代人加以说教、解释，使之了解并遵循着去做。可见，训和诂两个词最初在单独使用时，其内容是比较宽泛的，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的范畴。

“训诂”合成一个词，始于《毛诗故训传》。“故训”即“诂训”，是两个动词复合而成的并列结构的词，可以颠倒说成“训诂”。自从训诂合为一词并与“传”字同时使用于《毛诗故训传》中，训诂一词所表示的内容就基本上属于语言学的范畴了。举《诗经》一个最常见的例子：

《诗·周南·关雎》：“关关雎

雎，在河之洲。”《毛传》：“兴也。关关，和声也。雎雎，王雎也。鸟挚而有别。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

这一段是《毛传》对“关关雎雎，在河之洲”二句的全部解释。这里显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水中可居者曰洲”以上，是解释诗句的词义，说的是语言问题；“后妃说乐”以下，是毛亨站在儒家立场上对诗句思想内容的主观分析和发挥，与原诗所表现的思想截然不同，反映了汉儒对《关雎》的理解。对这两部分内容应该如何加以区分和理解？清人马瑞辰在解释《毛诗故训传》书名时，提出了一种见解，认为训诂是诠释经文的，传则是引申经义的。训诂只是就原文的语言加以解释，传则是引申发挥原文中所没有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在毛氏诗注

中，训诂被严格限定在语言学的范围之内，而传则是从非语言学的角度对《诗经》的解释，训诂不是传，传也不等于训诂。从古今的训诂实践看，可以说马瑞辰的见解较为准确地地区分了训诂与传的差异，也较为恰当地概括了训诂的语言学的属性。

尽管训诂与传的内容各异，但是它们却统摄在同一部书中，互相交插，浑然成一整体。这是因为它们的目的、任务是同一的，即“解释”。但如果把训诂与注释混为一谈，甚至象某些学者说的那样，认为训诂学就是解释学，训诂就是讲清楚怎样注释的道理，那就会把不属于训诂的内容归属于训诂的范畴，混淆了不同的概念，误以为注释就是训诂。而面对古籍的注释，训诂家们又往往仅从古代语言学的角度加以研究，对训诂以外的注释却略而不谈，致使今日训诂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而有关注释的理论，尤其是训诂以外的注释理论仍然是个空白。

训诂与注释的概念混淆是自古有之的。在漫长的训诂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古代的训诂家们只积累了丰富的训诂实践经验，而没有建立起一套系统的训诂学理论体系，所以也就不可能严格地确定训诂学的内容、对象、目的和任务。前人训诂实践的主要形式是给古书作注，注释的内容是对古籍中一切需要加以说明和一切难于理解的事物进行解释。由于古代的训诂家们缺乏严格的理论和明确的概念，所以对于以注释形式出现的不同内容往往不能加以区别而统谓之训诂。在给训诂下定义时，也往往使用一些较为模糊的概念。如孔颖达说：“然则训诂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

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说训诂是解释并没有错，然而并不是一切的解释都是训诂，所以这个概念是模糊的。实际上，当人们面对纷纭复杂、各种内容纠葛在一起的古籍注释资料而说训诂的时候，一般都会限定在传统语言学的角度，很少有人对语言文字之外的注释进行研究。例如古今研究《毛传》训诂条例和训诂内容的不乏其人，却没有一例把“后妃说乐”之类的内容当作训诂来研究。这说明在实践中训诂家们是十分清楚训诂学的性质和内容的。因为古代的训诂学只重实践不重理论，所以理论落后于实践，一旦进行理论上的概括，难免会出现一些模糊的概念。

明确了训诂学的性质和内容，再来讨论训诂学与注释的关系就比较容易了。训诂学与注释的关系，概括来说就是它们之间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本质区别；既有部分内容交插重叠；同时又泾渭分明，有着明显的差异。注释中有训诂，但不能包摄所有的训诂内容；训诂中也有注释，但不是一切注释皆属于训诂。我们知道，传统的训诂学有两种实践的形式，即专书的训诂和传注的训诂。专书的训诂主要是编撰字典辞书，如《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之类都属于专书的训诂。其主要任务是汇集古代文献中各种语词的常用的、基本的或全部的含义，融会贯通地加以研究，作出准确、简明的解释。这类训诂可以成为古籍注释的工具，但不是注释。

传注训诂的主要任务是解释古籍中词语的意义，它既属于训诂，又属于注释。训诂与注释的交插重叠和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传注训诂与注释的关系

上。传注训诂解释古籍词语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原文，而这也正是注释所要达到的目的，从这一点说，传注训诂就是注释。但不能反过来说注释就是传注训诂，因为除了词义的解释之外，注释中还有很多内容，如历史事实的考证、说明、补充；名物典故、引用书籍的介绍；思想内容的分析、发挥、批判；作者创作意图的分析、评价；文学作品的艺术欣赏和评价；各种材料的补辑、辨析等等，都可以以注释的形式出现，都可以称为注释，但这些内容与训诂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注释和训诂在不相重叠部分的差异，体现了注释与训诂的质的区别，标明了它们是相对独立的两个学科。那么，训诂与注释的区别何在？它们相对独立的标志是什么？具体说来，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对象不同。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是古汉语的词义。它把古汉语的词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研究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而且其对象并不限定在同一部书之内，它可以就一部书的词义进行研究，也可以打破书与书的界限和时代的界限，以词语为核心研究其横向的或纵向的意义变化。而注释的对象一般都限定在同一部书的范围之内，而且要比训诂学的对象复杂得多，只要与解释或说明古籍意义有关的内容，比如作者的生平、思想、创作目的，书籍写作的历史背景，书籍表现的思想内容、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等等，都可作注释的对象。至于某些选本的注释，情况更加复杂。例如《昭明文选》和《古文观止》，虽然从形式上看都是一部完整的书，但由于文章的作者非一，作品的风格多样，体裁不同，注释所面临

的问题就更多了，既要从总体上研究选编者的标准、意图和全书的意义，又要研究各个作者、各篇文章的具体情况。总之，训诂学的对象比较单纯、明确，而注释的对象则比较复杂多样且富于变化。

第二，方法不同。训诂的对象是古汉语的词义，所以必须遵循训诂学探求词义的方法。传统的训诂学探求词义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即形训、音训、义训。而注释由于其对象是多元的、变化的，所以方法也是多元的、变化的。

先说注释对词语的解释。由于词语解释具有两重性，既是训诂的一部分，又是注释的一部分，所以它必须遵循传统训诂学解释词义的方法，同时又要具备注释的特点而与训诂有所区别。具体地说，注释对词语的解释必须从全书、全文的整体思想、整体结构以及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等问题的理解出发，研究词汇在特定语言环境中的具体意义，既要基本词义为依据，又要根据上下文的关系来确定词义；既要参考字典辞书的解释，又切忌生搬硬套。以《诗经》中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诗句“四牡騤騤”的解释为例，其中“騤”字，按照《说文》的解释其本义是“马行有威仪也”。这句诗在《诗经》中出现了三次，每次出现《毛传》都没有照搬它的本义，而是根据不同的语言环境，联系每一首诗的历史背景和感情色彩诸因素，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小雅·采薇》：“驾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毛传》：“騤騤，强也。”《采薇》是描写周文王时派遣战士守卫边疆的诗，用“强”字解释“騤騤”，表现了出征战马的雄武强壮。《大雅·桑柔》：“四牡騤騤，旂旐有翩。乱生不夷，

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於乎有哀，国步斯频。”《毛传》：“騞騞，不息也。”《桑柔》是讽刺周厉王时国势混乱，肆意征伐的诗，《毛传》的解释有助于揭露频繁征战，奔走不息，劳国害民的混乱情况。《大雅·丞民》：“四牡騞騞，八鸾喑喑。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毛传》：“騞騞，犹彭彭也。”上章有“四牡彭彭”，《毛传》：“彭彭，行貌。”騞騞，亦行貌。《丞民》是讽喻周宣王疏远贤臣的诗。“四牡騞騞”是形容仲山甫出走的样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色彩，所以用“行貌”释之。同是“騞騞”一词，出现在三个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而这三种不同的解释都是从各诗的整体意义出发，为整体意义服务的。

由此可见，注释中解释词义的方法具有随文释义的灵活性。所以有这种灵活性，是因为注释中对词义解释的着眼点是特定语言环境中的具体意义，必须了解注释对象的历史背景、思想内容和感情色彩等方面的因素。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词汇在具体语言环境中表达的意义与词的本义相比，多少都会有些变化。因此，仅靠训诂学解释词义的传统方法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全书的整体出发，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知识，对影响词义的各种因素进行较全面的分析，才能对具体语言环境中的词义作出较为准确的解释。

以上说的是注释中的词义解释。由于其本质上仍属于训诂学的范畴，所以仍然要以训诂学的传统方法为基础，同时又必须从注释的对象出发，采用一些非训诂学的方法，才能达到注释的目的。而注释中与词义解释无关的内容就不能采用训诂学的方法了。由于这部分

内容包括了很多方面，所以注释必须根据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要求而采用不同的方法。概括地说，词义解释之外的内容大致包括作者生平事迹、思想体系以及创作意图的考述与分析；作品的历史背景、思想内容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叙述与发挥；作品中历史事实、典章制度的考证；各种资料的补辑、辨析；作品文学艺术的欣赏与评价等等。仅这些内容就几乎涉及了文、史、哲等各个学科领域，如果再加上自然科学的古籍，内容就更广泛了。但是具体到某一部古籍的注释不一定都有这么多的内容，而且由于注释的目的与要求不同，因而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注释时只要掌握几种基本的和常用的方法就可以了。具体地说，这些方法主要有考据学、心理学、文学欣赏与评论、史学和哲学分析的一些基本方法。这里，我们举几个例子，简单地谈谈某些注释方法。

1.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是月，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诏宣王：“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火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

裴松之注曰：《魏氏春秋》曰：亮既屡遣使交书，又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宣王将出战，辛毗杖节奉诏，勒宣王及军吏已下，乃止。宣王见亮使，唯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对曰：“诸葛亮夙兴夜寐，罚二十已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过数升。”宣王曰：“亮体毙矣，其能久乎？”

《三国志》裴松之注是古今称颂的著名注本。裴松之认为，陈寿的《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因此他注释的主要目的是补充历史资料、考证历史事实，纠正原作者的错误。其中几乎没有词义的解释。因此裴松之所采纳的注释方法主要是史学考证和评论的方法。这里选取的一段，主要是引证其他资料，以补原文之缺。原文叙述了一个历史事件，没有什么错误，但裴松之认为陈寿叙述得不够完备，所以引证《魏氏春秋》的材料加以补充。

2. 《世说新语·识鉴篇》：“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

刘孝标注：按《世语》曰：“玄谓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遣子将，子将纳焉。”孙盛《杂语》曰：“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固问，然后子将答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世说》所言谬矣。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也是古代的一个著名注本。也是从引证材料、考证史实、纠正原书错误见长的，这里的一段，刘孝标是用史学考证的方法，引用书籍纠正原书记述之误。

3. 叶绍翁《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钱钟书《宋诗选注》：这是古今

传诵的诗，其实脱胎于陆游《剑南诗稿》卷十八《马上作》：“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不过第三句写得比陆游的新警。《南宋群贤小集》第十册有另一位“江湖派”诗人张良臣的《雪窗小集》里面的《偶题》说：“谁家池馆静萧萧，斜倚朱门不敢敲；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梢。”第三句有间字填衬，也不及叶绍翁的来得具体。这种景色，唐人也曾描写，尤其是吴融。例如他的《途中见杏花》：“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又《杏花》：“独照影时临水畔，最含情处出墙头。”但都因层次安排不当，没有像宋人这样写得醒目。

叶绍翁这首《游园不值》选者、注者可谓多矣，但注释的角度却各有千秋，而钱钟书先生则运用文学批评的方法，分析了这首诗构思的来龙去脉，在比较中既指出了叶诗与前人诗作的渊源关系，又分析了叶诗何以能取得超越前人的艺术成就。读者从这个注释中所获得的东西显然比阅读仅有语词解释的注释要丰富得多。在浩繁的古籍中，文学古籍占有极大比重，另外某些非文学性的古籍也包含有不少文学的内容，例如先秦诸子散文，几乎都是熔文学、史学、哲学为一炉的，对这些古籍也需要从文学的角度加以阐释，所以以文学艺术分析为主的注释，在注释工作中是不可或缺的。